論　著

據象鬭戰或騎象入京？——南方女主的譜系建構與其文學敘事*

胡　曉　真**

摘　要

「女主」是歷史上為數不多卻形象鮮明且被賦予豐富意涵的一種女性角色。本文主張，若考慮與王朝維持羈縻關係的土司制度，則南方的女土司亦可納入歷史上的女主的範圍。明清時期，「南方女主」在文人的敘事中已形成譜系，其中女主與女酋的形象縱橫交錯。女主不只具有政治意涵，本文從不同類型的文本，包括史傳、筆記、文學

*　筆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言。全文文責，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1 年 11 月 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 年 4 月 12 日。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以及視覺意象，討論文學與文化中的女主形象如何透過修辭而形成，又牽涉何種歷史文化的脈絡。

關鍵詞：女主、女酋、女土司、冼夫人、南方

前言

本文以特定意義的「南方」爲範圍，討論歷史與文學中地域性的女性首領如何被呈現的問題。討論材料涉及的南方，主要是中國西南的雲南、貴州、廣西一帶，向東延伸到廣東與福建。如此範圍顯然相當廣袤，個別地區之間在自然與人文上的差異也很大，但在概念上，相對於北方、中原、江南等等，這一「南方」在話語上——例如族群與性別文化——又被賦予某種邊緣的共性，因此我將之設定爲本文的討論範圍。

「女主」是一個眾所熟悉的題目，但其實這一詞彙具有某種模糊性，除了正式意義上的「女性的領導人」以外，在通俗話語中也發展爲「女主角」的略稱。在本文的討論中，將保留兩者之間的曖昧交疊，這是因爲本文乃在一個「敘事」的概念裡面進行討論，重視文本的視角、結構，敘事對材料的選擇甚至虛構。我們將分析在史傳、筆記、小說、詩詞，乃至是視覺性的文本中，如何通過敘事的運作，使女性領導人被賦予英雄或者反英雄的特質。同時，除了人格特質與特異作爲，也必須注意女主因其在群體中的領導位置而影響群體命運的關鍵性，如何成爲敘事的焦點。換言之，本文涉及

的女性領導人皆爲歷史人物，處理的文獻包括文學性文本與一般歸類爲非文學性的文本，如史傳、方志等。本文的討論並非辨明這些女性人物的實際經驗，而是探索她們在文本中被賦予意義的過程。本文將試圖指出，在地域文化與繼承制度下產生的「南方女主」，曾留下不絕如縷且鮮明的足跡，本身即是一種值得重視的歷史現象，這又吸引了文人的關注，促使「南方女主」在文人的書寫中逐漸形成譜系。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南方女主與中央王朝交涉時做過不同的政治選擇，於是，文人建構的女主譜系中也出現對立而又糾葛的形象。至於「南方女主」的具體意涵，將在下文中說明展開。

楊聯陞的文章“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打開了女主研究的風氣，翻譯成中文後影響深遠。[1] 杜芳琴的〈中國歷代女主與女主政治略論〉則詳細梳理了女主的意涵、思想與制度的來源，以及歷代發展中女主政治不同的表現方式。[2] 近年的女主研究又有新的氣象，例如，雖然宋代宮廷婦女較爲守禮，但像劉后這樣的女主畢竟還是進入了學者視野。[3] 初步檢視近年中文學界對「女主」的研究，若先不論

---

1 Lien-sheng Yang, “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3 (1961), pp. 47-61. 中文翻譯見楊聯陞著，林維紅譯，〈中國歷史上的女主〉，《食貨月刊》，卷 1 期 11（1972 年 2 月），頁 570-577。

2 杜芳琴，〈中國歷代女主與女主政治略論〉，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95），集 4，頁 35-60。

3 例如劉靜貞，〈從皇后干政到太后攝政——北宋真宗之際女主政治權力試探〉，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91），續集，頁 123-161；Keith McMahon, “Women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 *Nan Nü* 15:2 (January 2013), pp. 179-218。甚至李慧淑對宋代宮

研究深度的問題，可以發現臺灣的研究較集中（但非僅限於）於中央王朝統治者如慈禧與武則天，而中國大陸的研究更常涉及邊疆與非漢民族的女性首領。例如，在一篇文獻回顧的文章中，作者便指出，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對邊疆上層女性的研究湧現，其中，代表西南土司文化系統的上層女性奢香與代表北部草原文化系統上層女性的土默特「三娘子」，研究成果最爲豐碩，可以反映學界對明代邊疆少數民族上層女性研究的動態。[4] 但如果從研究的視角來看，正如該文作者所見，對這些邊疆地區女主的研究，偏向評析這些上層女性的歷史功績，強調其「民族英雄」的形象與對「多元一體」格局之進程的貢獻。[5] 換言之，古代女主的研究與當下中國的政治文化與需求是相呼應的。相對的，近年臺灣學界對女主的討論，則明顯轉向制度與倫理的交錯、美學與皇權政治等問題。例如，蔡幸娟聚焦於北朝歷史條件下對女主的褒貶議論；[6] 李貞德整體觀察鮮卑女性，並通過北魏太后介入公主家庭暴力事件來討論法律與性別；[7] 許正弘以對元代政治有重大影響的答己太后爲例，重新思考元代太后與漢文化的

廷女性藝術的探討，因為涉及藝術與權力的問題，也可在此脈絡中理解。參見 Hui-shu Lee,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4 康其，〈明代少數民族上層女性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呼倫貝爾學院學報》，卷 27 期 5（2019 年 10 月），頁 16。

5 康其，〈明代少數民族上層女性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呼倫貝爾學院學報》，卷 27 期 5（2019 年 10 月），頁 20。

6 蔡幸娟，〈時論與北朝女主政治——兼論漢魏時代女主政治時論之濫觴〉，《成大歷史學報》，期 25（1999 年 12 月），頁 39-65。

7 李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臺北：三民書局，2002）。

關係；[8] 王正華視慈禧不同版本的肖像爲「視覺資源」，延伸出統治者形象塑造與輿論操作；[9] 余慧君從慈禧的收藏展示討論帝國的運作。[10] 這些研究都從女主出發而展開不同領域的論說。

以上的簡略覽要也顯示，「女主」之稱一般僅施於宮廷女性，即如杜芳琴所定義，「女主」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男主的母、妻（妾）、女中以某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參與或干預政治，並對政治發生一定影響的人」。[11] 筆者前面引述大陸學者的考述，也謹愼地以「上層女性」稱呼那些非屬王朝宮廷的女性政治首領。不過筆者以爲，如果我們重新思考統治與政權，那麼在分裂、割據、羈縻等等情況下，宮廷以外的女性執政者也可以視爲一種女主的形式。在西南地區，這種地方的政治空間以最具體的方式存在，那便是與中央王朝維持羈縻關係的半自治的土司制度。土司統治，特別是在明代，其實是與中央王朝的直接統治分庭抗禮的地方政權，而土司特殊的繼承制度一方面反映了地域及族群文化中女性可以掌權的特色；一方面在制度層面形成養成女主的土壤。早期探討土司制度的學者黃開華曾如此說：「西南土官與一般流官最大不同之處，厥爲官位世襲之制度。而此種制度

8 許正弘，〈元答己太后與漢文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期 53（2011 年 7 月），頁 89-108。

9 王正華，〈走向「公開化」：慈禧肖像的風格形式、政治運作與形象塑造〉，《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期 32（2012 年 3 月），頁 239-320。

10 余慧君，〈從皇家靈囿到萬生園——大清帝國的動物收藏與展示〉，《新史學》，卷 29 期 1（2018 年 3 月），頁 1-57。

11 杜芳琴，〈中國歷代女主與女主政治略論〉，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集 4，頁 36。

中，最足表徵其特色者，則爲特殊承襲下女土官之出現。此種女土官權位之性質，與一般君主世襲國家女后聽政或正式登極，大致相似。」[12] 黃開華指出，土司爲世襲制，其實與中央王朝政權的繼承可以類比。換言之，土司統治可謂「國中之國」，[13] 雖然這個「國」不同於我們今天認知的「國家」，但確實具有相當的內部統治的政治權力，以及被王朝承認的繼承制度。從未在中央王朝制度化的女主繼承，卻在土司地區發生並延續，使得女主繼承的制度化成爲土司政治的重要特色。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視角，那麼女主就不只是中央王朝執政的太后、皇后、女皇帝，大可以包括國中之國的女土司。

本文主張，地方政權如出現足以影響政治甚至實質執政的女性，也堪稱爲女主。並且，若與王朝宮廷的女主相較，這些位處邊緣的女主，在文學敘事上有不同層面的表現，也留予我們不同的詮釋空間。土司與中央的關係可謂千絲萬縷，非本文可以說明，但大致可知，清代比前代更加積極實行改土歸流政策，所以沒有那麼多勢力強大足以抗衡中央的土司，而女土司雖然繼續存在，也不那麼耀眼了。但明代的情況卻不一樣。西南土司實力堅強，明朝開國時期，必須爭取西南土司的支持，之後，土司的「叛服無常」一直是王朝的嚴重問題；但另一方面，西南土司強大的兵力如「狼兵」，

12 黃開華，〈明代土司制度設施與西南開發〉，收入《明史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冊 5，頁 143。

13 例如，清中葉文人評論已經改土歸流的湖北容美土司，便以「自成國」、「國中之國」來形容中央只能間接統治的土司地區。見龔傳瑜，〈田九峰宣慰墓〉，見吉鍾穎編，《鶴峰州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冊 45，卷 13，頁 61（總頁 263）。

也是朝廷在諸多戰役中仰仗的力量。在這種複雜的中央與土司的關係中，對中央而言，土司與賊寇經常是一而爲二，二而爲一。這便爲女主敘事增添了更多面向。「女主」除了具有女性政治領導人與敘事上的女主人翁的歧義外，本文也將引申出另一個看似矛盾、其實相關的詞彙，那就是「女酋」。酋者，首也，經常用於指稱部落的首領，又或是作爲負面用語，組成「匪酋」、「賊酋」這樣的詞彙。位處邊緣而又具有執政權力與慾望的女主，經常被中央王朝定義爲女酋。女主與女酋的形象時而背行，時而交錯，共同形成文人建構的女主譜系。增加這一個角度，可以使我們對女主敘事的解讀更爲豐富。由以上的思考脈絡出發，本文將討論王朝制度下，處在疆域內部但屬帝國邊緣之女主的產生與活動，而文人又如何通過不同類型的文本，建構出女主的譜系以及想像空間。

一、南方女主——從嶺南冼夫人到交趾徵女王

南方的女主譜系可謂源遠流長。爲了說明女主譜系中相對形象的淵源，我們可以暫時撇開明代熱鬧登場的女土司不談，先造訪西元 6 世紀及以前的南方。我們將以女主的角度，重新認識赫赫有名的冼夫人、被尊崇爲越南民族英雄的徵女王，以及其他形象鮮明的女性。

（一）歸化或中介？──嶺南聖母形象的意涵流變

直到今天，南方一些地區仍有所謂「年例」的習俗，海南稱爲「軍坡節」（公期），嶺南粵西稱「年例」，其他地

區也各有稱呼。這一民間習俗的起源是崇拜「嶺南聖母」，逐漸演變爲融合不同信仰元素及道教科儀的年例習俗。根據報導，當代的年例民俗形式包含祭祀、巡遊、宴會、娛樂等等，其中還有「穿杖」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驚人活動。這項祭祀習俗崇拜的「嶺南聖母」就是「冼夫人」。冼夫人廟分佈於廣東、廣西、海南，以及華人移民所至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14] 其實冼夫人正是一位代表性的南方女主。

在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刻的人物版畫集《南陵無雙譜》中，[15] 有一幅「譙國夫人冼氏」的圖像。冼夫人穿戴鎧甲，攜帶長槍與佩劍，昂頭直視，英氣勃勃。這一姿態與一般明清仕女畫的文雅纖秀、斂眉幽怨頗爲不同，顯然是女英雄的造型。畫面中的冼夫人顯得風采端麗，且戴著增添美感的頭飾。這幅畫像既要表現冼夫人作爲一方領導者的權威沈

14 有關嶺南聖母與海南地區軍坡節、粵西年例的說明，整理自以下數種資料。盧方圓、葉春生主編，《嶺南聖母的文化與信仰：冼夫人與高州》（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 177-210；李沛琦，〈明清海南島女性神信仰的文化地理學考察〉（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20 年 6 月），頁 39-50；龔禮茹，〈嶺南女神信仰研究——以龍母、冼夫人和媽祖為中心〉（深圳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8 年 6 月），頁 55-68；冼春梅，〈粵西高州地區冼夫人民間祭祀圈與信仰圈〉，《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學報》，卷 25 期 2（2015 年 4 月），頁 91-94。

15 《南陵無雙譜》為金史（古良）所繪，刻工是朱圭，是一部重要的人物版畫圖譜，被稱為清初浙派版畫的名作。畫家金古良與毛奇齡友善，且能透過毛氏得到王士禎為之作序。圖冊表現了四十位畫家認為難能再得的卓越歷史人物，寄託其教化勸喻之心。參見許媛婷，〈託畫以言志——論金古良《南陵無雙譜》版本及其繪編意旨〉，《故宮文物月刊》，期 263（2005 年 2 月），頁 48-58。同時值得一提的是，圖譜 40 個人物中有 8 名女性，且金古良在自撰的題詞中經常表達有女如此，何必重生兒的意思。

穩，也要突出她的軍武特質，同時還要維持俊美的形象。如果與《無雙譜》中其他的女性畫像相較，冼夫人的面容被描繪得比孝女曹娥與趙娥、才女班昭與蘇蕙、墮樓的綠珠、從軍的木蘭，乃至稱帝的女主武則天，都更顯得五官清晰，堅定明麗。畫像旁的文字簡述冼夫人的生平，對頁的題詞署名「鉄堂」，鉄堂即是《無雙譜》的畫家金古良。該題詞道：

> 冼夫人
> 高涼妻，能將鐵騎擊瀧西。
> 高涼母，能取金印懸兒肘。
> 高涼使，能招叛亡人不貳。
> 百越部落長晏然，夫人撫馭七十年。
> 中州男子三易姓，區區一媍總其令。[16]

這首題詞雖短，卻照顧到冼夫人生平事蹟的幾個重大層面，結論更是鏗鏘有力，直指冼夫人成功統治百越地區長達 70 年，在此期間，中原早已歷經了三個不同的朝代。「區區一媍（婦）」看似貶抑，其實正是反面的褒揚，在中原頻繁改朝換代的對比下，突出女主的成功治理。不過，值得思量的是，雖然畫家在題詞中突出了冼夫人的統治者地位，圖像則仍然選擇以戎裝表現，不同於同一畫冊中對武則天朝服的表現。同時，這幅圖像的服飾也未表現冼夫人的南越民族屬性。

6 世紀時期，由南朝的梁朝、陳朝過渡到統一南北的隋朝，在「高涼郡」地區（今廣東的一部分），出現了一位歷經三朝而始終穩定統治的土酋女主，後世稱爲「冼夫人」(522?-602)。唐、宋時期有關冼夫人的正史記載包括：《隋

16 題詞引自〔清〕金史繪，《無雙譜》，收入《中國歷代人物像傳續編》（濟南：齊魯書社，2014），冊 2，頁 956。

書》列女傳有〈譙國夫人〉傳，《北史》列女傳有〈譙國夫人冼氏傳〉，《資治通鑑》在「梁紀」、「陳紀」、「隋紀」皆有相關記載。彙整這些史料，大致可以知道：冼夫人的家族世代都是南越地區的首領。「南越」就是廣東地區的「百越」，後來發展爲黎族、瑤族、畲族等族。根據這些史料，冼夫人自幼便展現了行政與軍事的領導能力，「幼賢明，多謀略，……，撫循部眾，能行軍用事，壓服諸越」，[17] 讓海南、儋耳都歸順於她。梁朝時期，她與高涼太守馮寶結婚。馮寶原是北燕的皇族後代，父親馮融是梁朝的羅州刺史（亦在今廣東地區），看上了這位冼家女性的才能，因此爲子求親。我們不難看出這樁聯姻創造的政治利益，《隋書》就講明了：「融本北燕苗裔，……，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18] 也就是說，來自北方的馮氏無法成功管理南方，通過冼夫人的勢力，馮氏才得以穩定地方。「民禮」應當指的是漢人的習俗。這說明了王朝的官員與地方勢力的結合。

根據《隋書》的記載，在南朝的梁朝、陳朝轉換之間，冼夫人先是阻止馮寶介入侯景之亂，後又慧眼看重陳霸先，歸附陳朝，使得百越地區「數州晏然」，安然無恙。學者早已指出，梁、陳之間，正是北方南下的所謂「僑人政權」被南人的力量取代，也逐漸認同南方的變革時期。[19] 也就是

17 〔唐〕魏徵編，《隋書》（臺北：中華書局，1981），卷 80，列傳 45，〈譙國夫人〉，頁 3b-4a。

18 〔唐〕魏徵編，《隋書》，卷 80，列傳 45，〈譙國夫人〉，頁 3b-4a。

19 陳寅恪曾論證永嘉南渡之後，「巴蜀谿俚」各族之「江左土人」逐漸取代北人的過程。參見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本 11（1943），頁 1-25；陳寅恪，

說，從北方南渡的漢人在移民到南方後，仍保有本籍的認同，並且希望維持中原士族的優越地位，但最終仍會融入南人社會。同一時期，南方的「土著」、「蠻族」也開始有突出的表現。陳朝陳霸先的帝業，在嶺南冼夫人的勢力扶助之下建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陳朝亡時，「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20] 換言之，此時冼夫人才是嶺南地方的共主。是否稱王，根本不是重點。她在確認陳朝已亡之後，率眾歸附於隋。根據《隋書》，當年冼夫人爲了向陳朝表達歸附之意，曾貢獻「扶南犀杖」。扶南位於今天東南亞的湄公河三角洲，犀杖是用當地犀牛角製作的珍貴貢品，具有強烈的地域特色。此杖在陳朝亡時，落入隋朝之手。此時，楊廣（當時爲晉王）逼迫陳後主寫信給冼夫人要求她歸化新朝，並且附上犀杖做爲證據。冼夫人見到犀杖，便明白陳亡隋興，大勢不可挽回。《隋書》說她率領數千首領，「盡日痛哭」，之後隨即歸順隋朝。「犀杖」在此成爲一個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的物品。

不但如此，冼夫人並且曾親自出兵幫助隋朝平定地方上的反叛，「夫人親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21] 巡撫諸州。歷史紀錄中冼夫人「出巡」的裝束，既展現女將風範，也強調她「代表中央」的正統性，但反過來也是向中央炫耀她在地方上的政治權威。果然，隋高祖追封馮寶爲廣州

〈梁陳時期氏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收入萬繩南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頁 202-214。

20 〔唐〕魏徵編，《隋書》，卷 80，列傳 45，〈譙國夫人〉，頁 3b-4a。

21 〔唐〕魏徵編，《隋書》，卷 80，列傳 45，〈譙國夫人〉，頁 3b-4a。

總督譙國公，封冼夫人爲譙國夫人。冼夫人把梁朝、陳朝、隋朝的賜物分開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便公開展示，並且教訓子孫說：「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22]《資治通鑑》把這一句改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俱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23]「好心」與「忠順之心」有細微的差別，頗足品味，可以體會宋人將重心進一步從地方利益轉移到中央正統的用意。無論哪個版本，冼夫人對子孫的訓誡表達的仍是「效忠中央政權而非一家一姓，從而保全、發展地方」，可說其策略性高過忠君的道德性。在流傳後世的敘事中，這便是冼夫人作爲嶺南女主的最高原則。

在《亦神亦祖：粵西南信仰構建的社會史》一書中，作者賀喜勾勒了在王朝政治政治需求下冼夫人形象的演變。作者指出，唐代魏徵主導編寫《隋書》時，刻意創造一個全然向化的冼夫人形象，這是唐代懷柔蠻夷政策的反映，冼夫人是土酋忠誠最好的宣傳。[24] 冼夫人在宋代以後就是「表達地方與中央王朝關係的符號」，「既是地方的領袖，又是歸附的象徵」。[25]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還指出明代是冼夫人信仰流布的關鍵期。作者解釋，明憲宗成化年間（15 世紀下半葉），在兩廣瑤亂的背景下，冼夫人信仰被不同人群重新「重

22 〔唐〕魏徵編，《隋書》，卷 80，列傳 45，〈譙國夫人〉，頁 3b-4a。
23 〔宋〕司馬光編，《資治通鑑》（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卷 177，頁 23-24。
24 賀喜，《亦神亦祖：粵西南信仰構建的社會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 38。
25 賀喜，《亦神亦祖：粵西南信仰構建的社會史》，頁 21。

視、敘述並改寫」，官方敘事轉爲強調國家武力與文教，提倡蠻夷歸化，於是冼夫人也不再是早期《隋書》記載中扮演的中央王朝與地方之間的中介者。[26] 賀喜的看法，不只具有史學意義，對本文解讀明清時期有關冼夫人的文學文本，也有很大的啓發。

（二）冼夫人與南方女主形象的疊合

蘇軾貶謫嶺南時曾有詩稱頌冼夫人，但這是因爲他看到當地冼夫人廟頹敗，所以有感而發，可見宋朝時冼夫人信仰較爲式微。但誠如賀喜所論，明代中期以後，冼夫人文化在民間傳說與文學作品中發酵。在民間信仰中，被神化的冼夫人具有各種神力，與人們的財富、健康、子嗣等等發生連結。[27] 不過，文人敘事中的冼夫人，仍圍繞著女主的形象發展。我們尤其可以留意冼夫人的南方邊緣地區非漢族的身分，在文人的書寫中如何表現。

晚明謝肇淛(1567-1624)在包羅萬象的《五雜組》（或作《五雜俎》）一書中如此記錄並評論冼夫人：

> 高涼冼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三軍，懷輯百越，奠安黎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智功勳，有馬援、韋臯所不敢望者。孃子軍、夫人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嫗輩無論已。[28]

謝肇淛的看法，基本上延續唐宋以來對冼夫人的詮釋，亦即

26 賀喜，《亦神亦祖：粵西南信仰構建的社會史》，頁 191、199。

27 例如，根據學者研究，海南有關冼夫人的神話有 15 種。參見陳雄，《冼夫人在海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頁 11-30。

28 〔明〕謝肇淛，《五雜組》，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子部，冊 37，卷 8，頁 212 上。

冼夫人是一位同時具有軍事與治理才能的女性，長期安定了民族構成複雜的百越地區。《五雜組》既然稱爲「雜組」，很難據以推論作者具有系統性的女性觀，但謝肇淛在此書的「人部」的確談論了各種特異的女性，且提出一些新鮮的看法。而在有關冼夫人的這段話裡，他將冼夫人分別與古代男性、女性的英雄人物做一比較，將她放在最高的位置。拿來做比較的男性是東漢的馬援(14 B. C. E.-49 C. E.)與唐代的韋皋(745-805)，二人都曾在南方建立功業——馬援平定了交趾，韋皋長期治理蜀地並征戰南詔、吐蕃。韋皋也被蜀地人們奉爲神明。[29] 然而謝肇淛卻認爲冼夫人的才智功勳在某些方面勝過馬、韋二人。在女性方面，作者抬出了唐平陽公主(？-623)之帶領娘子軍，以及晉朝韓夫人抵抗苻堅的夫人城故事（事在公元 378 年），這兩個佳話都只是單一事件，歷史影響自然不能與冼夫人相提並論。這段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徵側、趙嫗輩」作爲比較。筆者認爲，娘子軍、夫人城不過是鋪墊，真正要比較的正是「不足論」的徵側與趙嫗，因爲這兩位女性才是與冼夫人有可比性的南方女主，整段話的重點落在表面上輕描淡寫的最後一句。

徵側、趙嫗何人也？她們是中、越歷史書寫各自表述的傳奇人物。伏波將軍馬援於漢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遠赴交趾所平定的就是徵側與其妹徵貳，即中國歷史書寫中所謂「二徵之亂」。《後漢書》如此記錄二徵之亂：

29 《資治通鑑》卷 236：「皋在蜀二十一年，……，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宋〕司馬光編，《資治通鑑》，卷 236，頁 18-19。

> 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並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30]

《後漢書》只記錄了事件，二徵並無突出的面目，只是被貼上了「賊」的標籤。但是，清代的諸種廣西方志則樂於引用這段話：

> 五嶺之地粵險阻絕，古稱南交。……其婦人亦能驅牸牝，貫勁彎，頭纏花裹，開軍府，拜跪千餘人，不敢仰視，如徵側、徵貳者，不可勝計。伏波銅柱之功，以二女子而立，此史書之可信者也。[31]

這段話的原始出處應是清初人謝天樞，他在順治十八年曾擔任廣西慶遠府的推官。為了說明廣東、廣西、湖南一帶所謂「五嶺之地」的強悍民風，他指出當地不乏擁有軍武權威的婦女，而曾經讓馬援親自出征的徵側、徵貳，就是最好的例子。「驅牸牝，貫勁彎，頭纏花裹，開軍府，拜跪千餘人，不敢仰視」，驅駕著座騎，拉弓射箭，千人拜服，這是極有

30 〔宋〕范曄，《後漢書》（臺北：中華書局，1981），卷 54，列傳 14，〈馬援列傳〉，頁 8。二徵的結局，在中、越歷史記載中也並不相同。

31 如《廣西通志》、《慶遠府志》、《平樂府志》、《永安州志》等。《廣西通志》又為《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 1398「廣西總部紀事」所引用。

畫面感的形容，而且不但寫出這些婦女的英武，更突顯其領導地位，畢竟，能夠開軍府，令千人跪拜，必然掌握了政治權力。

徵側、徵貳在中國史書與方志中是被平定的反賊，但在越南歷史中，卻是傳奇性的開國之主。在越南正史《大越史記》中，徵側被稱爲「徵女王」。〈徵女王紀〉如此記錄：

> 徵王──在位三年。王甚雄勇，逐蘇定，建國稱王。然以女主，不能成再造之功。[32]

也就是說，當時交趾原在漢治下，徵女王建國稱王，雖然僅僅在位三年，但相較於此後千餘年「男子徒自低頭束手，爲北人臣僕」，[33] 徵女王的霸王之業足以不朽。不只如此，徵側姊妹在死後也成爲當地人心目中「能捍災禦患。凡遭災傷水旱，禱之無不應」的靈驗神明，[34] 正如冼夫人之成爲嶺南聖母。[35] 至於趙嫗，則是三國時期，帶領九眞郡人民反抗東吳並獲得廣泛響應的女性，在中、越的文獻中都有記載，後

32 黎文休、潘孚先、吳士連等編，孫曉主編，《大越史記全書》（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66。

33 黎文休（1230-1322）語。黎文休、潘孚先、吳士連等編，孫曉主編，《大越史記全書》，頁 67。

34 史臣吳士連（約 15 世紀）曰：「其英雄氣概，豈獨於生時建國稱王，沒後能捍災禦患。凡遭災傷水旱，禱之無不應。徵妹亦然。」黎文休、潘孚先、吳士連等編，孫曉主編，《大越史記全書》，頁 68。在越南漢文小說中，二徵以「戴芙蓉冠，綠衣朱帶，駕鐵騎」的姿態，降雨救旱，得以受封為「貞靈夫人」，見陳世法等撰，《嶺南摭怪列傳》，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甲本，冊 1，〈貞靈二夫人傳〉，頁 43-44。

35 徵側姊妹在當代越南學者所撰的越南史上同樣享有尊崇的地位，認為她們挺身抗暴，流芳百世。可參考陳重金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 29-30。

世也成爲越南崇拜的英雄。[36] 如此可以推知，謝肇淛將冼夫人與徵側、趙嫗做一比較，正是指向冼夫人既能在軍事與政治上統領百越，何嘗沒有建國稱王的實力？而他所做的「徵側、趙嫗輩無論已」的評價，自是他以明代中國爲中心的視角出發，稱揚冼夫人的政治智慧。

不同於二徵的是，文獻中的趙嫗被賦予更爲突出鮮明的形象。宋代的《太平御覽》數次提到趙嫗，部分引自晉人劉欣期（生卒年不詳）所著之《交州記》。其文曰：

> 趙嫗者，九眞車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群盜，遂攻郡。常著金擒碮屐。戰退輒張帷幄，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史吳郡陸胤平之。[37]

這個記載裡有幾個彼此連結的重點：突出的生理特徵、不嫁的意志與旺盛的性慾。[38] 乳長數尺當然是超乎尋常的，或許正因畫面過於鮮明，所以後出的材料無一例外都承襲了這個說法。不論現實中的趙嫗是否眞的如此性徵發達，此一生理特徵已成爲這個人物之強烈內在的外顯方式。「不嫁」而非「未嫁」，也非寡婦（如徵側），表示這是個人意志的決定，而這當然是不符合儒家倫理秩序的。選擇不嫁，就是一種對抗性的表現。但趙嫗不嫁並非寡欲，相反地，她在出戰之後，性慾更爲高漲。這種與複數少男性交的形象，也出現於其他女主的記載，尤其以武則天的面首最爲突出。其實關於秦良

36 《太平御覽》與《大越史記全書》皆有趙嫗的記載。

37 〔宋〕李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371，頁 1709。同為宋代編纂的《太平寰宇記》則說趙嫗「乳長五尺」，見〔宋〕樂史編，《太平寰宇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460，卷 171，頁 582。

38 感謝 Haun Saussy 教授對趙嫗之「不嫁」特質的提問。

玉也有類似的說法，還得要靠文人為她辯誣。同樣的，這不是一個可以查考的問題，重點其實是記載者如何調整其目光，以及想要賦予什麼意涵。在這則記載裡，「與少男通」必須與「不嫁」並讀，便可見出突顯其抗拒姿態的效果。不過，這一不嫁而通少男的形象，似乎並未擴散。唐代編撰的《初學記》根據作於劉宋時期的《南越志》（現已亡佚），提到趙嫗穿著「金箱齒屐」，「恆居象頭鬥戰」。[39] 越南正史《大越史記》的記載有類似之處，而更誇張描述趙嫗的形體特色：

> 後九真女趙嫗，嫗乳長三尺，施於背後。常乘象頭與敵交戰，聚眾攻略郡縣，胤平之。《交趾志》：九真山中有趙妹女子，乳長三尺，不嫁。結黨剽掠郡縣。常著金褐齒屐，據象頭鬪戰，死而為神。[40]

這裡引用的《交趾志》應該也是中國的文獻，待考。這段描寫包括趙嫗的身體（乳長三尺）、裝扮（著金褐齒屐）以及動作（據象頭鬪戰），是否與實際的情況相符自然無法證實，但已成為一種固定的人物形象。在近代越南的民間版畫「東湖畫」中，也特別表現趙嫗騎象的英姿以及其發達的乳房。[41]

39 〔唐〕徐堅編，《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8，頁 193。

40 〈屬吳晉宋齊梁紀〉，收入黎文休、潘孚先、吳士連等編，孫曉主編，《大越史記全書》，卷 4，頁 79。

41 有關越南東湖版畫的簡要介紹，可參見蔡玉琴，〈越南年畫中的中國元素與本土特色〉，《中國政法大學學報》，期 5（2008 年 10 月），頁 63-81。趙嫗在東湖版畫中的形象，可參見 Vietnam Nation Museum of History 官方網站：http://baotanglichsu.vn/vi/Articles/3098/14281/cuoc-khoi-nghia-cua-trieu-thi-trinh.html（2021 年 10 月 15 日查閱）。相對而言，二徵的在民間圖像雖然也常表現「騎象」，但身體的特徵則不明顯。

這些記載都沒有提到與少男通的情況。其中，《大越史記》沒有記載與少男通，當然可能是徵引的中國文獻本來如此，但也可能反映出史家受到儒家價值的影響。總之，當晚明的謝肇淛將冼夫人、徵側、趙嫗放在一處，反映的正是當時人對南方女主已有某種共同認知。

在極端突出的形象塑造上，趙嫗與嶺南的另一位冼氏也發生重疊。清初，屈大均(1630-1696)在其作爲廣東外志的《廣東新語》中，[42] 列出了粵人所謂「五女將」，分別是二位冼氏、虞夫人、寧國夫人李氏、詹氏。然而，在介紹這五女將之前，屈大均卻先舉出越女的徵側、徵貳、趙嫗三人。這可能是因爲歷史上交州與五嶺之地關係過於密切，因此屈大均認爲應納入討論範圍，亦誠如學者所論，《廣東新語》在分類結構上便不以政治爲依準，使得不同定義下的「異類」都得以呈現。[43]

在提到徵側時，他認爲「古女子僭號爲王，華戎皆所未有，可異也」，[44] 提到趙嫗時，他則描述「嘗著金箱齒屐，居象頭鬥戰」的形象，但貶抑其不過爲女賊。[45] 而所謂「二冼氏」，其一是秦末趙佗（240 或 241-137 B.C.E.）建立南越

---

42 《廣東新語》成書時間有多種說法，大抵介於於康熙十九年與康熙二十八年之間。參見張秀蓉，〈論《廣東新語》的經世之學〉，《東吳歷史學報》，期 7（2001 年 3 月），頁 59；林宜蓉，〈世變下士子撰史的多元意蘊——試論屈大均《廣東新語》之化外深意〉，《清華學報》，卷 50 期 1（2010 年 3 月），頁 69。

43 林宜蓉，〈世變下士子撰史的多元意蘊——試論屈大均《廣東新語》之化外深意〉，《清華學報》，卷 50 期 1（2010 年 3 月），頁 78。

44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8，「女語」，頁 256-258。

45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8，「女語」，頁 256-258。

國時，率高涼軍民投靠趙佗的冼氏。其二則是本文討論的冼夫人。屈大均如此描述第一位冼氏的形象：

> 冼氏，高州人，身長七尺，兼三人之力。兩乳長二尺餘，當暑遠行，兩乳輒搭肩上。[46]

這形象何其眼熟！稍晚於《廣東新語》，康熙、雍正年間人范端昂所著《粵中見聞》一書，也出現了一模一樣的記載。[47] 不過，最早提出類似說法的，可能是唐代劉恂的《嶺表錄異》。[48] 另外還有更爲誇張的說法，冼氏搭在肩上的兩乳竟然「長七尺餘」。[49] 不論二尺、三尺或七尺，施於背後或搭在肩上，趙嫗與冼氏的身影在文獻交錯徵引的網絡中似乎重合了。屈大均、范端昂都是粵人，但他們也都自然引用文獻中對秦代末年冼氏形貌的描寫。這是因爲他們在古人文獻徵引的傳統下書寫，或者因爲他們受到多民族地區漢文化對非漢人文化之觀看習慣的影響呢？[50] 當然，更值得思考的是《大越史記》對中國文獻的承繼引用與揉捻變化，不過那又是另一個主題了。

從史書到筆記，南方這些集軍事與政治能力於一身的女性，逐漸在文人的書寫中成爲一類群體，或可說一種譜系。

---

46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8，「女語」，頁 256-258。

47 〔清〕范端昂輯，《粵中見聞》，收入《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冊 56-57，頁 3-6。

48 〔唐〕劉恂，《嶺表錄異》原書已散佚，輯佚本未收「冼氏」條。但明代談氏初印本《太平廣記》曾引錄，見〔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270，頁 2116-2117。

49 例如，《太平寰宇記》卷 161 記錄冼氏「乳長七尺」。見〔宋〕樂史編，《太平寰宇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60，頁 501。

50 相關討論可參考喬玉紅，《古代嶺南女性社會形象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7），頁 33-36。

其中的徵側與趙嫗，隨著越南脫離中國統治，成爲越南開國女王與民族英雄，但是直到中國的明清時期，她們仍然在文人以嶺南爲地域的思考中佔有一席之地。同時，中國文人也藉著與徵側姊妹及趙嫗的比較，突出冼夫人象徵歸化的意義，賦予她更高的價值。如此一來，冼夫人的南方女主的形象，便朝著三代「忠臣」的方向偏移。同時，唐、宋以來的文獻中，秦末冼氏的形體特色與趙嫗有所重合，明清文人之所以樂於引述，多少是文人對南方以及女體的想像的投射。文人建構之南方女主譜系中的兩種相對形象也從這裡延展出去。不過，「據象頭鬪戰」的強烈畫面在後世還有轉化，容後再敘。

（三）無力回天的朝廷代言人 ── 吳偉業《臨春閣》中的冼夫人

冼夫人從地方女主轉化爲王朝忠臣，在清初《南陵無雙譜》的圖像中具體呈現。圖冊選列的 40 位人物中，唯有冼夫人來自邊緣地區，並且被賦予勇武、權威、美感全備的形象，這必然是在長期的敘事脈絡中發展，而在明清時期成熟的。本文在這一節中將以吳偉業(1609-1672)創作的雜劇《臨春閣》爲例，討論冼夫人的文學形象。

《臨春閣》應該是最早以冼夫人爲主角的戲劇作品。學者多認爲吳偉業寫冼夫人，乃是用南朝之亡向南明之亡致哀，寄託了作者的興亡之感。例如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就說：「此亦爲哭明亡之作，似以陳後主比明福王者。」[51] 李

51 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328-333。

惠儀進一步指出此劇實以女英雄反寫晚明男性的衰弱無能。[52] 該劇劇情可說相當簡單。劇中的冼夫人憂國憂民，不齒陳朝諸臣的無能，她在進京朝見陳後主時，與貴妃張麗華交換對國是的意見。《陳書・張貴妃傳》如此描述張麗華：「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妝，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53] 不過，拜杜牧的〈泊秦淮〉之賜，多數人更記得的是陳後主把張麗華抱在膝上處理國事，又爲她寫《玉樹後庭花》的歌曲在宮廷傳唱，這使得張麗華要不是「女禍」的代表人物，就是被命運擺弄的無助女人。不過，顯然吳偉業拒絕了這樣的歷史評斷。他選擇把張麗華寫成一個以國爲重、有見識、有遠見的女性政治人物。[54] 劇中張貴妃與冼夫人對國家情勢有共同的關懷，在政治意見上形成同盟的關係。

相對於張麗華以才女之姿力圖救國，劇中冼夫人展現的則是鎮守邊境一方的權威。我們不妨看看《臨春閣》的第一折。冼夫人出場的裝扮是「戎服錦傘」，展示她奉詔巡邊的威嚴。她在唱詞中把自己與包括馬援在內的古來男女英雄並列，還要教「閼氏捧轡，徵貳擎鞭」，也就是說她身邊服侍

52 Wai-yee Li,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pp. 241-251.

53 〔隋〕姚察編，《陳書》（臺北：中華書局，1981），卷 7，列傳 1，〈張貴妃傳〉，頁 5。

54 楊中薇稱之為未能實現的「從尤物誤國到才女救國」。楊中薇，〈論吳偉業的遺民製作——《臨春閣》與《秣陵春》劇作中的「物」、「才女」與「離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4 月），頁 18-29。

的都是北方與南方的女王級別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因爲這是一次巡邊的行程，所以，通過冼夫人的自道，吳偉業還勾勒出一幅南方的國際地圖。

冼夫人出場後，便自述受皇命「巡視諸邊，那各路諸侯，外邦君長，齊集轅門，聽吾將令」，之後嶺南、嶺北各州刺史進見，次則「緬甸國、扶南國、眞臘諸國使臣」。這是一個從國內到中國以南諸國的秩序。冼夫人的唱詞如此：

> 你金葉文書字樣鮮，舞也波旋，語駢連，赤志沙嘴臉波斯眼。疏花布，將頭纏，五色線，把環穿。穩吃那一碗兒桄榔麵。[55]

這幾句唱詞連續提到外交文書使用的文字以及舞步、口語、容貌、服飾、食物等等與外國接觸時立即感受的「外國性」，也將冼夫人這個人物放在代表中國進行外交工作的位置上。之後，冼夫人繼續表述自己身處的交涉網絡，接見了「羅羅等處宣慰司，木瓜、仡佬等處軍長官」。[56] 這裡列舉的都是明代的西南各地土司，「宣慰司」、「軍民府」都是元、明的設置。冼夫人責備這些土司叛服無常，並爲王朝與土司的關係提出雙贏的解決方式。她的唱詞道：

> 你那邊輸些銀絹，俺這邊賞些錦緞，咱兩邊沒些嫌怨。進用單，依前件，雜差徭，權放免。止供著賧布賨錢。[57]

賧、賨是南方民族以財物贖罪或交稅的方式。冼夫人指示各

---

55 〔清〕吳偉業，《臨春閣》，收入《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1364。

56 〔清〕吳偉業，《臨春閣》，收入《吳梅村全集》，頁 1364。

57 〔清〕吳偉業，《臨春閣》，收入《吳梅村全集》，頁 1364。

地土司按著規矩進貢供輸，那麼朝廷自然也有相應的賞賜。做出此等宣示的冼夫人自然也是代表王朝而發言。冼夫人一開場就自報家門爲「高涼冼氏譙國夫人」，[58] 但作者又始終迴避了她並非漢族的問題，冼夫人甚至表示：

> 但須廣布朝廷德意，宣慰十路軍州，無謂女子乘邊，致使越人輕漢。[59]

唱詞不只表現角色對性別的自覺，也在漢、越之間做了明確的認同選擇。劇末，陳朝覆亡，冼夫人得知張貴妃殉國，大悲之下，決定入山修道。這當然與歷史上冼夫人的抉擇不同，更可知全劇以「哭南明之亡」爲意旨之不虛。

吳偉業在劇中觸及中央朝廷與南方土司之關係的問題，應是有意爲之。一方面，西南地區土司之叛服無常的確對明代造成很大的威脅，吳偉業一定深有所感。另一方面，劇作背後很可能還有具體的指涉。近代戲曲理論家吳梅在《中國戲曲概論》一書中，指出《臨春閣》劇中冼夫人的角色其實是爲了晚明女英雄秦良玉而發。[60] 秦良玉正是晚明時期四川石砫女宣慰使，一生戰功彪炳，曾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參與平播州宣慰使楊應龍的「平播之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參與遼東戰爭。天啓初年，參與平定永寧宣撫使奢崇明與貴州水西土司安邦彥的奢安之亂。之後還曾率兵勤

---

58 這當然是時間的錯置。冼夫人在不同朝代的封號不同，封譙國夫人是隋朝的事。

59 吳偉業，《臨春閣》，收入《吳梅村全集》，頁 1363。

60 吳梅，《中國戲曲概論》，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9），輯 1，冊 63，頁 10。陳芳、杜桂萍亦主此說，見陳芳，《清初雜劇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頁 96；杜桂萍，《清初雜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211。

王，加入平定張獻忠的戰役，並參與抗清活動。[61] 不論是播州楊應龍，或是四川永寧的奢崇明、貴州水西的安邦彥，都是雄踞一方的土司。秦良玉自己是土司，而多次受朝廷徵召參與平定其他土司叛亂的戰役，所以明朝朝廷對她恩遇有加，視之爲忠義的表率。吳偉業推崇秦良玉，又看到了秦良玉與 6 世紀的冼夫人之間具有某種可比性——她們雖然時代差距很大，但都是南方女主的身分，因此用冼夫人來寫秦良玉。只不過，因爲劇作本身哭南明之亡的時代意義，吳偉業強調了影射秦良玉的冼夫人這個角色對朝廷的忠義，也發揮「美貌女將」形象的象徵意義，[62] 於是，歷史上冼夫人的政治選擇對維護嶺南本土與民族的意義，便被壓抑甚至忽略了。[63] 由前文的說明可知，冼夫人詮釋的轉型，早已在明代的脈絡中不斷進行，《臨春閣》可以說是一綜合的表現。

61 參見〔清〕張廷玉等編，《明史》（臺北：中華書局，1981），卷 270，列傳 158，〈秦良玉傳〉，頁 7-9。又可參見秦良玉史研究編纂委員會編，《秦良玉史料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或黃明光對秦良玉參戰紀錄的簡述，見黃明光，〈南方各省女土官執政現象研究〉，《廣西民族師範學院學報》，卷 30 期 1（2013 年 2 月），頁 22。

62 Wai-yee Li,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p. 248.

63 不過，也有學者指出此劇中冼夫人形象的片面性。可參張筱梅、王馗，〈吳偉業《臨春閣》雜劇中的冼夫人〉，收入盧方圓、葉春生主編，《嶺南聖母的文化與信仰：冼夫人與高州》，頁 143-151。

二、效法二徵？還是向冼夫人學習？——女土司的政治選擇

吳偉業的雜劇《臨春閣》以冼夫人影射晚明四川女土司秦良玉，這一設計引領我們聯想不同類型的文本中更完整、形象更鮮明的西南女土司。本節中將以兩個例子說明「女主敘事」的歷史與文學形象，如何在「二徵、趙嫗」與「冼夫人、秦良玉」的光譜之間移動。

前文提過，嶺南冼夫人的「扶南犀杖」象徵政治權力，這既是來自中央王朝賦予的政治權力，也是中央與邊緣的政治協商的表徵。可相類比的情況也在西南地區發生。西南地區，大致包括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地方，匯集了地理與文化上的邊緣、政治權力與武力威脅、異域風情乃至香豔聯想等諸種元素，具有豐富的歷史與文學意蘊。而女性統治在西南歷史上更具有很高的關鍵性。

以下的討論將集中於西南地區的傳奇性的女土司。「女英雄」的故事容易引起注意，也經常成爲文學創作的素材，女土司在其中又有特殊的地位。筆記、詩文或小說戲曲都有女土司出入，而在史傳或承載地方記憶的志書中，女土司的敘事也往往不乏文學趣味。女土司既是女性，又是「異族」，偏偏又掌握權力，這些因素匯集之下，女土司的事蹟對中國文人無可諱言有獵奇的吸引力，但也經常啓發文人想像乃至深思中央與邊緣、漢與非漢民族等等問題。[64]

黃開華、龔蔭等學者對明代土司的研究早已指出，除湖

64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頁 221。

廣諸土司外，西南各區經常出現女土官。[65] 只要翻閱《明史》的「土司傳」，便知此言不虛。清代土司雖然衰弱，女土司仍然存在，有學者統計明清兩代女土司與女土目的數目可達 300 人之多，且出現在彝人、藏人、白人、壯人以及臺灣原住民的社會。[66] 不過，黃開華發表其土司研究是上世紀 60 年代，當時他所持的態度是理所當然地支持中央對西南的開發大業，因此也傾向肯定女土司與中央合作的作爲。現在我們重新審視相關的資料，當然會有較爲多元的視角。

首先簡單回顧一場元代女土司叛變的歷史事件。[67] 元成宗五年(1301)，貴州發生了一場嚴重的動亂。當時，大臣劉深向元成宗進言，慫恿皇帝進攻八百媳婦國（在今泰國、緬甸一帶），以昭帝國武功之盛。成宗派劉深領軍，大軍行經貴州時，以軍需爲名，向當地的土司進行征斂。於是，貴州水東地區的土司宋隆濟發難叛變，之後，水西女土司奢節也響應。最後元成宗不堪壓力，決定撤軍，殺劉深以謝天下。相對的，叛變的宋隆濟與奢節也在成宗七年(1303)被俘並處決。奢節是亦奚不薛宣慰司土司（即水西土司）阿畫的妻子，阿畫在 1297 年去世後，由奢節繼爲土司。順便一提，在不

65 黃開華，〈明代土司制度設施與西南開發〉，收入《明史論叢》，冊 5，頁 144；龔蔭，《明清雲南土司通纂》（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5）。

66 連瑞枝，〈土官與他們的女兒——帝國周邊的政治與社會聯盟〉，《臺大歷史學報》，期 65（2020 年 6 月），頁 33-74。

67 以下關於奢節與奢香的討論，見於胡曉真，〈通俗與審美：中國西南地區女土司的貢物〉，收入崔基淑編，《集體情感的譜系：東亞的集體情感和文化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8），第二部，頁 215-234。奢節事蹟亦可參張純德、朱琚元、白興發，《彝文古籍與西南邊疆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264-265。

同的漢文史料中，有「奢節」、「蛇節」不同的寫法，這是因爲音譯彝族語言的關係，實爲同一人。不論是《元史》的記載，或明代有關貴州的筆記、方志等紀錄，大臣劉深固然因爲輕啓戰端又智謀不臧，備受批評，但奢節的形象無疑是可懼的叛亂首領。她出現於官員學士檢討邊疆政策的文章中，[68] 但很少成爲文人吟詠感懷的審美對象。然而，對 14 世紀以降的貴州彝族而言，奢節這個人物所引發的情感，一定不同於元、明、清任何一代朝廷官員的觀感。[69]

如果把奢節視爲一個反抗中央王朝的女土司的代表，那麼，應與奢節故事反向參照的，是 50 年之後同一水西地方的女土司奢香的故事。明初女土司奢香與明太祖協商交手以保全水西，從明、清到當代中國也有不同的歷史詮釋。嘉靖年間的文人田汝成撰有〈奢香〉一文，以小說家筆法記載了奢香的故事，[70] 雖然未必完全符合史實，影響卻很大。在這個版本的故事裡，元末水西土司名叫靄翠，在入明後策略性地歸附明朝，死後，其妻奢香繼立。靄翠正是奢節之夫阿畫的同族後人。故事中，奉太祖之命而來的都督馬燁以嚴厲的

68 例如，明嘉靖年間郭子章擔任貴州巡撫時編撰了地方志《黔記》，郭子章在評論邊臣不應挑起戰爭，以免損害國家利益時，便是以蛇節（奢節）的事件為例。〔明〕郭子章，《黔記》，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冊 3，頁 460。

69 冼夫人這類與中央王朝達成協商的人物一直享有尊崇的地位，相比之下，起兵反抗的奢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得到的評價差異很大。在當代中國的史觀詮釋裡，奢節被表現為帶領彝族反抗暴政的彝族民族英雄，在黔西有為她設立的紀念塚，墓碑上題的字是漢文與彝文並列的「烈姬塚」。二徵、趙嫗則是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得到完全不同的定位。

70 〔明〕田汝成，《炎徼紀聞》，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冊 3979，卷 3，〈奢香〉，頁 33-34。

方式治理貴州，他謀劃盡滅當地的羅羅（彝族），使貴州徹底郡縣化，實施直接統治。他故意以「裸撻」的方式侮辱奢香，藉以激怒其族人起兵叛變，如此，大明就有藉口以武力攻伐了。幸而水東女土司劉氏暫時安撫羅羅，並前往南京謁見太祖，訴說冤情。於是太祖召來奢香，二人談判之後，太祖答應殺馬燁爲奢香報仇。作爲交換，奢香則承諾爲太祖「刊山通道」，亦即開通從貴州通四川、雲南的山路。如此，太祖就得以借道貴州而更有效的掌控雲南了。故事結尾，馬燁遭誅，奢香與劉氏受封爲「夫人」，得到皇后豐富的賞賜，榮歸貴州。奢香也遵守承諾，爲太祖開通山路，設立驛站，並且世世進貢，即田汝成所謂「馬匹廩餼世世辦也」。

田汝成描述中央王朝與邊疆政權之間的政治協商，是一文學性很高的精彩故事。奢香與太祖的協商可謂雙贏，雙方各自付出了馬都督的頭、羅羅族人的刊山勞力、以及世世的貢品；各自得到的，則是通往雲南的山路，以及水西地區免於兵禍且維持羈縻自治的狀態。回想吳偉業《臨春閣》中的冼夫人，她對西南各土司的要求，亦正是如此一種雙方滿意的契約交換。

如果我們將奢香的政治選擇放在土司的傳承脈絡中理解，或可別有所得。彝族有自己的書寫系統，即彝文(*nuosu bburma*)，故在口傳之外，也有文字的歷史與文書流傳。身爲土司，奢香應曾接觸彝文歷史與父老口述，不會不知道祖先奢節叛變的始末。當然，水東的女土司劉氏也同樣可以借鑑前代土司宋隆濟的命運。相對的，明太祖意在通過貴州掌握雲南，也必然考慮元成宗與貴州作戰失利的教訓。故此，二人的協商正是建立在歷史知識與政治判斷的基礎上。後代

文人以後見之明來看，便以二徵與冼夫人來代表南方女主面對中原王朝的兩種態度。秦良玉與奢香自然可以歸到冼夫人的一類，她們都選擇以歸附的策略與王朝折衝，而文人對她們的想像與表現，不只是讚美，而經常在忠貞與香豔之間游移，甚至可說女土司的「身體等同於羅羅族群，受到中央政權的裸露、規訓、憐惜與整束」。[71] 然而，衝突與抗爭並不會永遠消失，二徵、趙嫗、奢節這類人物，在文人的表現中則揉雜著鄙夷、驚訝、畏懼與尊崇，正如那乳放肩後、據象鬪戰的桀驁身影。

三、貞節的女主，忠義的土司——文人理想中的女土司譜系

從奢節說到奢香，我們注意到從元末到明初這兩位水西女土司都是繼承丈夫的職位。這種情況持續很久，例如，康熙《貴州通志》第三十卷「土司附苗僚」的「女官」條目，便指出：「羅羅以女官主事，諸土府皆然。」[72] 於此可知，女性可以承襲土司職位，既是習俗，也是制度，所以形成歷史上西南地區女性土司輩出的現象。不過，最早對西南女土司現象提出觀察的，應該還是元代《雲南志略》。元成宗五年，也就是宋隆濟與奢節起兵的同一年，一位名叫李京(1251-?)的官員奉派到雲南擔任烏撒烏蒙道宣慰副使。在雲

71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頁 232。

72 〔清〕薛載德纂，衛既齊修，閻興邦補修，《貴州通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省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冊 13，頁 460。

南期間，他四處巡覽並記錄見聞，詳細描繪雲南的地理、民族、人文特色，後撰成《雲南志略》一書，被稱爲最早的雲南地方志。李京如此描述羅羅族（即彝族）的頭目繼承制度：

> 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父之位。若耐德無子，或有子未及娶而死者，則為娶妻，諸人皆得亂，有所生，則為已死之男女。酋長無繼嗣，則立妻女為酋長，婦女無女侍，惟男子十數奉左右，皆私之。[73]

這段敘述廣爲流傳，成爲權威性紀錄，在明清時期更是所有有關西南風俗之文字引述的源頭，連諸種「苗蠻圖」都是引用這段文字搭配「羅羅女官」（即女土司）的圖像。據此，則奢節在阿畫死後繼承水西土司職位，奢香在靄翠死後繼承，皆爲羅羅族的習俗。不過，《雲南志略》的描述還不夠完整，因爲就實際情況來看，不只是妻、女可以襲夫、父之職，母女之間、姑媳之間也可以繼承。學者查考明代西南地區女性世襲土官的現象，發現在《明實錄》、《土官底簿》、方志等文獻上皆有記載，土司的母親、妻妾、女兒、媳婦等女性家人均可世襲土官。[74] 清代毛奇齡《蠻司合誌·序》所謂：「每襲替必奉朝命，其無子弟者，即妻人皆得襲替」，[75] 就是這樣的情況。

研究雲南的宋恩常於 1960 年赴雲南永寧調查納西族，他在查閱歷史文獻時發現川滇黔地區盛行所謂「母權制」，

---

73 〔元〕李京著，王叔武輯校，《雲南紀略》（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頁 90。

74 黃明光，〈南方各省女土官執政現象研究〉，《廣西民族師範學院學報》，卷 30 期 1（2013 年 2 月），頁 21。

75 〔清〕毛奇齡，《蠻司合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冊 735，頁 355。

認爲這與當地的群婚習俗有關，也是西南地區女性土司傳統的社會背景。[76] 他考察了記載明代正德以前西南土官家譜的《土官底簿》，發現在西元 14-16 世紀（亦即洪武到正德年間），在烏蒙（昭通）、芒部（鎮雄）、東川、武定、尋甸、楚雄、路南、羅雄（羅平）、順州（麗江境內）、馬龍、阿迷（開遠）、蒙自、嶍峨（峨山）、烏撒（貴州威寧）等彝族地區，土官常由婦女襲職。這裡所謂土官，包括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等各級到土司。然後他參考《明史》、《明實錄》等史料，以地區劃分，整理出不下數十位明代女土官。包括洪武年間入貢的東川女土司攝賽、水西女土司奢香、烏撒女土司實卜、東川女土司勝古、建昌府女土司師克、武定女土司商勝、武定女土司商智、尋甸女土司沙姑；宣德年間的永寧女土司奢蘇、順州女土司觀音銘、楚雄有母女接續爲土司；正統年間的四川芒部女土司奢貴；弘治年間的普安州女土司米魯；萬曆年間的者氏、隴氏、奢世續、安素儀；嘉靖年間的武定女土司瞿氏、鳳氏；天啓年間水西女土司奢社輝等等。另有許多「土官妻」雖未襲職，卻與土官分享權力，或者共同進京朝貢者。宋恩常的統計令人眼界大開。最近，還有學者根據前行研究，以表格方式輯錄明清時期四川、雲南、貴州的女土司共 130 人，並詳列名字、族屬與任職年代，亦頗便於參考。[77]

這些可考的女土司雖然未必成爲文學表現的對象，但確

76 宋恩常，〈明代彝族女土官史料初輯〉，收入雲南省編輯組編，《雲南彝族社會歷史調查》（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 389。

77 黨會先，〈明清西南地區女土司述略〉，《遵義示範學院學報》，卷 22 期 6（2020 年 12 月），頁 18-23。

實活躍於歷史舞台。例如，雲南武定女土司商勝就與奢香一樣，曾與明太祖進行交涉，主動歸附並獲得封贈。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詔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誥曰：

> 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爾黔中之地，官皆世襲，間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土官法叔之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於是並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帶。[78]

太祖的誥命傳達的訊息很清楚。首先，他決定尊重西南人民的習俗，承認其繼承制度，給了女土司襲職的合法性。其次，他將柔淑、剛貞這些價値，「奉送」給女土司，同時肯定其主動「來歸」，可以說也是爲了解釋自己的決定。最後，他鼓勵土司朝貢，並且跟同一時期的奢香故事一樣，用賞賜衣冠的方式象徵對邊疆非漢民族的「文明化」工作。不過，即使如此，女性繼位土司的合法性還是需要一再確認。例如，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順州土官同知之子死，當地人民認爲其子之妻觀音銘「處事公當，人皆信服」，希望由她襲職。吏部奏報宣宗，結果宣宗認爲：「以蠻夷治蠻夷，心相信矣，其從之。但世襲，祖宗成憲，不可違也。」[79] 看來，宣宗雖然想堅持「世襲」，但也不得不承認西南地區傳統繼承制度，也間接認可了女性可以得到人心的信服。

---

7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刊，《明實錄・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冊 6，總頁 2433。

7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刊，《明實錄・明宣宗實錄》，冊 17，總頁 461。

前文提到，黃開華、宋恩常等學者爬梳明代史料，發現明代女土司輩出且頗有作爲，也不時對中央朝廷造成威脅。清代改土歸流之後，土司勢力不如前代，女土司的事蹟與形象也不再那麼突出。不過，清代文人們卻對女土司的現象更加有興趣，他們特別受到那些影響歷史發展的女土司故事的吸引，而且往往傾向以王朝的觀點，爲女土司的功業重新賦予意義。像奢香這樣成功與朝廷達成協議的女土司，很容易被清代文人納入儒家與國家體系。[80] 例如這首清代著名詩人吳嵩梁(1766-1834)任黔西知州時寫的詩：

順德夫人宣慰使，大節千秋功萬里。
華年十四嫁通侯，二十孀閨守孤子。
四十八部九郡兵，一日不戢邊患生。
丹闕恭承天子詔，銀甸坐鎮夫人城。
彼哉馬氏稱都督，撫馭乖方恣貪酷。
陰謀激反殲諸羅，命婦公然受廷辱。
熊羆十萬氣可吞，誓死不負中朝恩。
贖珠同心出奇計，奢助偕行叩九閽。
陳冤上訴高皇帝，哀感六宮亦流涕。
請誅一將定蠻天，願鏟千峰作平地。
雪棧雲林路險艱，白厓赤水阻重關。
一自龍場開九驛，頓忘鳥道極千盤。
貞可閑家忠報國，子孫世世承恩澤。
華衮榮褒賜姓安，茅土從今固磐石。
譙國前有馮夫人，石砫後有秦將軍。

（南梁譙國夫人，威鎮南疆）

80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頁 233。

蛾眉同畫籌邊策，鳳綍曾邀諭祭文。
五百年來陵谷改，一抔黃土嗟猶在。
更無華表數嶙峋，誰勒豐碑禁樵採。
馬鬣崇封整廢阡，護持終賴裔孫賢。
修祠合近埋香地，補種梅花作墓田。[81]

這首詩重述了奢香的故事，從少年守寡說起，歷數她受馬都督侮辱，與水東女土司劉氏同赴京城訴冤，爲朝廷開龍場九驛，朝廷賜姓爲安，死後獲得太祖欽賜祭文等等經歷。另一方面，作者也淡化處理明代紀錄中奢香與太祖之間的政治妥協，更不提保全水西自治的策略，而是以忠貞報國、榮受國恩爲定義奢香的主線。吳嵩梁生活於乾嘉時期，清代大規模的改土歸流政策早已施行，無怪乎詩人把奢香描述爲一名歸順的命婦，而不是一個有謀略的女主。我們更當注意詩中的這兩句：「譙國前有馮夫人，石砫後有秦將軍」，作者已自注馮夫人即是譙國公馮寶的夫人，即冼夫人，秦將軍則是石砫女土司秦良玉。這個比附讓人想起吳偉業的《臨春閣》。前已分析過，冼夫人歷經梁、陳、隋三朝，她最大的成就其實是保全嶺南地方，但在詩人「蛾眉籌邊策」的籠罩性思考下，不只是奢香，連冼夫人的功業也被徹底詮釋爲對朝廷盡忠的貢獻。

秦良玉的聯想更不待言，詩意直接聯繫她參與平定播州土司之亂、協助對抗流寇等忠於明朝的事蹟。作爲負責重修奢香墓的地方官，吳嵩梁扮演的是朝廷的代言人，這首詩「充

81 〔清〕吳嵩梁，《香蘇山館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90，卷 17，〈明順德夫人領貴州宣慰使奢香，墓在大定府城北烏龍坡，湮沒久矣。其裔孫今訪得之，將為立碑建祠，賦詩以紀〉，頁 145。

滿了道德與政治符碼」，[82] 亦可謂理所當然。值得留意的是，在清代文人的論述中，「明季多奇女子」成爲一種共識，如李惠儀所說，隱然形成女英雄的系譜，而秦良玉也成爲邊緣地方的忠孝節義的化身。[83] 可以說，秦良玉代表了所有自冼夫人以來的「忠良女土司」，進入這中華女英雄的系譜。若回到土司的脈絡中，那麼秦良玉則是承續著忠貞女土司的傳統，成爲壓軸大戲。諸多文人對女土司的詠嘆，拉出了一條想像的譜系，從冼夫人到明初的奢香，再到晚明的秦良玉，在清代文人的典範建構中，她們都符合「以地方女主爲朝廷忠臣」的期待，也形成了符合國家利益的理想南方女主的譜系。

四、女主/女酋形象的雜音與變像

奢香進京朝貢，秦良玉進京受封，都是理想南方女主的實踐。然而，除了這條被刻意建構的中央與地方女主合而爲一的理想譜系，其實還有一條充滿暴力、衝突、抵抗、威脅、顛覆的雜音路線。從二徵與趙嫗開始，到元代貴州女土司奢節的故事，都是如此。明代中後期女土司發動或捲入的各種政治鬥爭與戰爭，更是令人眼花撩亂。土司管轄的這些「國中之國」，對中央政權始終具有潛在的威脅，女土司因其性別角色，更多了一層所謂「陰性力量」的隱喻性。例如，晚明文人陳繼儒注意到女土司普遍存在，曾做出這樣的評論：

82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頁 234。

83 李惠儀，〈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嶺南學報》，輯 1-2（2015 年 3 月），頁 90-91。

> 中國主陽，而夷狄主陰，故宣慰土官及諸邊虜，皆聽婦人約束。[84]

他把夷狄與中國分別本質化爲陰、陽，再用以解釋女性執政等同於氣之陰者的外在顯現。清代毛奇齡在《蠻司合誌》中則有這樣的說法：

> 大略諸蠻尚淫，多女子為政，其襲替多女土官，異於他族。致如建昌知府師克，武定知府商勝，東川知府勝古，烏撒知府實卜，皆洪武中女土官也。[85]

這裡所謂「淫」，亦應是氾濫、過度的陰的意思。這一思考方式在清康乾年間以秦良玉爲主角的劇作《芝龕記》中表達最爲完整，作者董榕把明末亂世描述爲「純陰之世界」，[86] 在氾濫的女禍中，純陰的女土司舉足輕重，端賴以女子之身而象徵「陰中之陽」的秦良玉才能壓制。於是，女主與女酋的形象交錯，在文本中形成了多元的趣味。

影響晚明歷史的西南動亂，首當屬從萬曆末年萌芽，一路延伸到天啓乃至與崇禎元年的「奢安之亂」(1621-1629)。這場動亂牽涉了貴州的土同知安邦彥、四川永寧宣撫史奢崇明、貴州水西土司安位等土司之間的複雜鬥爭，以及他們與明朝的抗爭。[87] 叛亂背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女性關鍵人物，那就是奢崇明的妹妹、安位的母親奢社輝。水西土司安堯臣

84 〔明〕陳繼儒，《太平清話》（明崇禎九年(1636)二卷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頁 30b。同樣題名為《太平清話》的四卷本則無此條。

85 〔清〕毛奇齡，《蠻司合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35，頁 355。

86 〔清〕董榕，《芝龕記・凡例》，收入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冊 35，頁 96。

87 其事始末可參〔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冊 3926，頁 146-158。

死，雖有兒子安位襲職，但安位年幼，故由母親奢社輝攝政，因此也成爲奢安之亂的核心。在《明史紀事本末》裡面，奢社輝的角色不太明顯，但是若看《明季水西記略》這樣的文本，雖然同屬私修史書，但個人視角與情緒更爲明顯，我們便可發現奢社輝的身影轉側其間：

> 貴州水西宣慰司安國亨子疆臣，萬曆中從討楊應龍有功。及死，無子，弟堯臣襲其職，堯臣死，子位幼，妻奢社輝擅司事。天啓元年，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反。奢、安本世姻，社輝又崇明女弟也。土同知安邦彥素桀黠，說社輝起兵應崇明，社輝然之。[88]

話雖不多，但奢社輝的關鍵性——專擅攝政、決定響應反叛等等，卻是躍然而出。又如前述《芝龕記》，以女土司秦良玉的英雄忠義，反襯男性的腐敗無能。劇中奢社輝只在作者的議論中出現，相對於秦良玉代表的英雄功業，女土司奢社輝與明朝宮廷的寵妃、女流寇紅娘子等一眾「女禍」，代表明末墮落的黑暗陰性勢力。在這一文學文本中，奢社輝並無人物面貌，可以說她只是作者對黑暗腐敗力量的想像的具象化。

晚明士人對西南女土司「黑暗力量」的想像是由時事激發的。奢社輝在奢安之亂中的角色固然重要，而奢崇明襲職永寧土司之前所發生的內亂，更是精彩絕倫，不下小說。這個事件在瞿九思(1546-1617)的《萬曆武功錄》中有所記載。該書所述爲萬曆間全國各地區、各群體、各民族的動亂以及

---

88 〔清〕李珍，《明季水西記略》，收入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史部，冊 12，頁 763-780。

平定的過程。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該書以人物列傳來敘述萬曆武功，但立傳的對象並非明朝官員，而正是那些成爲動亂源頭的邊緣人物。根據《萬曆武功錄》記載，萬曆初年永寧宣撫司土司的妻子名叫奢世統，又有妾室名叫奢世續，二人因立嗣的爭議，引發了一場長達 25 年的土司內亂。朝廷處理的方式竟然是在萬曆十三年對二名土婦都授給冠帶，並且分地讓二人各管所屬。20 年後，由奢崇明正式襲永寧宣撫一職，奢世續卻把官印私授給了水西土司安疆臣的妻弟阿利，引起更多亂子。直到萬曆三十四年，明王朝才終於裁定奢崇明承繼永寧宣撫使，結束了土司的內亂。[89] 奢世統、奢世續兩個女土司的內鬥，實猶如王朝宮廷內的權力鬥爭，她們成爲《萬曆武功錄》記述的對象，二人共享「土婦奢世統奢世續列傳」，也說明了土司女主一旦成爲帝國的「女酋」，亦自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既然女土司的實力如此強大，那麼在漢人官員與文人的眼目之中如何觀看她們？筆下又如何敘寫她們？我們以下面的例子略予分析。

首先，談到形象，在文字表現之外還有圖像，此所以職貢圖與百苗圖（苗蠻圖）近年頗受學界注意。在清代，不論是宮廷製作的職貢圖，或地方製作的苗蠻圖，都有土司的圖像。《皇清職貢圖》有男女各一的羅羅土司，諸多版本的苗蠻圖也都表現了女土司騎馬出巡或者出入土司府的畫面，題爲「女官」。學者考察諸種百苗圖後指出，圖冊中的「貴州八十二種苗」，每一族群都是有男有女的生活畫面，唯獨「猓玀」（羅羅）族下又設有一條目曰「女官」，即羅羅正妻，

89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頁 487-492。

可見在貴州苗夷族屬分類體系中，羅羅「女官」被刻意表現爲獨立的單一「族屬」。[90] 又據《百苗圖疏證》的說法，百苗圖之所以專列「羅鬼女官」，是因爲「『羅鬼』出自『羅氏鬼國』的縮寫，它是一個地方政權的用名，而不單是一個家支名」，以此顯示黑彝土司作爲中央王朝代理人的尊貴身分。[91] 筆者以爲，學者對清代百苗圖中「羅鬼女官」專立條目的觀察與解釋，正是從圖像的角度證明了女土司實爲「女主」的地位。不過，我們也需注意，清代實行改土歸流後，存餘的土司也遠不如明代之強盛，但百苗圖仍如此熱衷呈現女官，這並不是因爲當時的現實中有強大的女土司，而是一種對明代女土司的記憶，甚至可以說是「沉迷」，所以圖像表現的也正是人們對女土司的想像。[92]

百苗圖經常出現女官出巡或者官署女官的構圖畫面。那麼，當文人以文字表現女官的形貌姿態時，是否可能採取不同的觀察視角？文字表現的重點與圖像表現是否有可比之處？且先看看一個明代的例子。嘉靖十六年(1537)，雲南的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瞿氏母襲子官。雖然當時地方政府建議以流官掌印，但武定地方卻一再請求由女土司瞿氏掌印，最後吏部的裁定是：「土司掌印係舊規，宜如其請。」[93] 這條

90 王鵬惠，〈觀畫如異夢：《百苗圖》之「女官」版本比較研究〉，發表於「雛鳳清聲——文哲青年學者夏季論壇(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 年 7 月 22 日。

91 劉鋒，《百苗圖疏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 286。

92 Jing Zhu, *Visualising Ethnicity in the Southwest Borderlands: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 2020), p. 46.

9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刊，《明實錄・明世宗實錄》，冊 80，頁 4146。

紀錄說明了中央朝廷承認女土官掌印的正當性，以及這位瞿氏土官在地方上的政治實力。有一位明代文人曾留下他對瞿氏的印象。這位文人名叫顧起綸(1517-1587)，曾任廣西郁林州同知。他在嘉靖年間到雲南，有〈武定歌〉一首記載遇到武定軍民府女土司瞿氏的情景。詩曰：

〈武定歌〉鳳武定女守也乙卯夏余發安寧忽於碧雞關遇焉因書其事

碧雞關下鳳君過，白頭紫綬錦闌那。

毗盧冠子犀皮鞾，小蠻細馬雕鞍馱。

青鵲窠，白鵲窠（鵲巢夷人帽以青白鳥毳為之其形如巢），

毳髻半額交雙娥。

前軍後軍齊踏歌，帳裡吀麻呼叵羅。

（吀麻夷酒也叵羅夷之酒器也）

金叵羅，銀叵羅，憑陵博貝朱顏酡。

夜來野宿空山阿，月落吹蘆渡黑水。（即古之黑水）

客子聽之淚若何。[94]

詩中稱瞿氏爲「鳳君」，這是因爲武定軍民府本爲鳳氏土司，瞿氏乃是母襲子職。作者在碧雞關偶遇鳳家的瞿氏女土司，[95] 看到她身著土官的官服，繫著華貴的紫色綬帶，象徵朝廷授予的權力，官服外還披著織錦絢麗的披風。頭冠上裝飾著佛像，腳下踏著犀牛皮製的靴子，馬上馱著歌姬侍女，戴著細毛製作的帽子，形狀像是鵲巢，[96] 細髮覆額直到眉間。簇擁著女土司的軍隊，在軍帳中用金銀酒器豪邁飲著咂酒，深夜

94 〔明〕顧起綸，《昆明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攝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昆明五華書院刊本），卷下，頁 19a、b。

95 武定的鳳氏土司其實就是太祖洪武十六年下詔任命之武定女土司商勝的後代。

96 指武定彝族年輕女性戴的「鸚鵡帽」。

從山中傳來吹奏蘆笙的聲音。這首詩有著李白〈對酒〉一詩的影子，[97] 但是每一句都透露衝擊著詩人耳目的民族特色，從服飾打扮、歡宴飲食到樂器悲音，搭配著紫、青、白、金、銀等強烈的顏色，一切的圖像與聲音都用來襯托女土司的威嚴形貌，以及其隨從的熱鬧盛大，讓詩人在這許多一時並起的不熟悉的感官衝擊下，反而感受特別的孤寂，並興起了客途上的無限鄉愁。若擱置時代的差距，與後來清代百苗圖的表現對看，可以發現此詩與百苗圖都特別關注女土司的衣飾，座騎與從人也是描繪的重點。百苗圖以人物姿態或者土司與從人之間的位置關係，突顯女土司的權威，而這首〈武定歌〉則強調唱歌、飲宴、樂器造成的「聲勢」。同時，詩人將自己定位為客子，其情感介入其中，與所見所聞產生交流，這與百苗圖的製作與敘事目的也頗為不同。

明代顧起綸的〈武定歌〉設定了一個巧遇鳳君的敘事脈絡，促使讀者願意相信他的描寫有現實的觀察為根據。相較於此，清代文人寫女土司，更常納入竹枝詞的形式。本來，為了描述地方風土，文人往往喜歡利用起源於民歌的竹枝詞。清代就有多種以竹枝詞敘寫西南的作品，內容多以各族群的日常生活為主，不過，其中也有涉及女官者。[98] 雖然這些作品的作者是西南地區人士，或者曾在西南地區活動，但其作品本身卻不能說明女官確曾出現在他們的實際經驗

97 李白〈對酒〉云：「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駝。」〔唐〕李白，〈對酒〉，收入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冊 6，頁 3687-3690。

98 學者曾在竹枝詞選集中注意到若干相關作品。詹躍海，〈田雯《東川女官歌》與兩幅「女官圖」〉，《民族文學研究》，期 4（2015 年 8 月），頁 24-31。

中。同時，竹枝詞多爲七言四句，篇幅短小，一篇作品僅抓到一個重點而傳達一種情致。姑舉數例。乾隆年間中舉的余上泗本是貴州人，活動範圍也在貴州。他有著名的《蠻峒竹枝詞》一百首，其中即有一首專詠女官：

婢子分行捉繡袍，廳前移步曉雲高。

女官舊向圖中見，指顧江山亦自豪。

羅鬼長死，耐德即為女官。耐德，其妻也。織錦为長袍，其袖甚大，左右二女捧之而行。[99]

「指顧江山」這一動作，豪情畢現，已透露詩人認知中的女官其實是女主。不過，看來余上泗雖然是貴州人，但未必親眼見過女土司。他描述的是記憶中圖像上的長袍大袖、指顧江山的女官，很可能就是某個版本的百苗圖，[100] 若果然如此，也可側面說明百苗圖的流傳與影響。這首竹枝詞藉著誇張的大袖表現女官在地方上的統治權威，也間接展示了詩人對圖像的接受與再詮釋。再舉一例。時代相近的詩人舒位(1765-1816)曾經到貴州擔任幕僚，他的《缾水齋詩集》也收有〈黔苗竹枝詞〉數十首，大致是根據族群來描述其文化特色。在「猓玀」（羅羅）的四首中有〈女官〉一首：

錦緞招魂野色寬，精夫紅葬骨難寒。

未妨月沒教星替，梅額新加耐德官。

---

99 〔清〕余上泗，〈蠻峒竹枝詞一百首〉，見〔清〕黃宅中修，鄒漢勳纂，《大定府志．文徵六》，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冊 49，卷 58，頁 125。

100 諸多版本的百苗圖中，女官的穿著雖然都是大袖，但表現兩邊從人代為捧袖的圖像並不多見。表現從人捧袖比較明顯的例子，有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苗蠻圖》中的「羅鬼女官出行圖」，參見劉錚雲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史部，冊 21，頁 450。

其酋死，则以錦緞裹尸，焚于野。子幼不能嗣，则妻为女官耐德，猓玀言妻也。

其俗婦人用青布纏首，多帶銀梅花貼額。精夫見後漢書。[101]

舒位寫的是土司火葬的習俗，以及土司之妻在無嗣或子幼時下可以繼位的情況，可以說是以竹枝詞的形式說明這一女官當政的制度。除了以女官特有的額頭裝飾（「梅額」）代稱其人以外，並不特別描寫女官本人的模樣，反倒是那被「紅葬」的屍骨未寒的土司，因其如此容易被取代而讓人寄予同情。相較於余上泗與舒位的描寫，道光時舉人毛貴銘的作品別有趣味。他的《黔苗竹枝詞》中也有「女官」一首：

銀絲貼額鬢角斜，耳墜金環真大家。

裙拖三十又六副，爭看女官如看花。

土官死，子幼，耐德即位土司。其飾以銀絲花貼額，耳繫大金環，裙三十六幅。[102]

舒位的竹枝詞完全未寫女官的形象，余上泗寫的是自己看畫時注意到的女官服飾特色。毛貴銘的作品則有兩個特點，一是他表現了「近觀」的細節，二是他有觀點的自覺。從具有民族特色的額飾、髮型與耳環，寫到堪稱羅羅女性服飾標準的三十六幅褶裙，詩人以極少的字句，試圖表達女官的形象。畫龍點睛的是第四句。首先，既然說「爭看」，很難理解爲爭看一幅百苗圖，而似乎眞有一群人目睹了女土司。然而是誰「爭看」呢？顯然不是女官的同族之人。挨挨蹭蹭、爭先恐後只爲多看女官一眼的，當是好奇的漢族人士。這一句，詩人驟然將眼光從女官身上轉向圍觀的眾人，而詩人自

101 〔清〕舒位，《缾水齋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冊 479，別集，卷 2，〈黔苗竹枝詞〉，頁 241。

102 〔清〕毛貴銘，《黔苗竹枝詞》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616，頁 501。

己豈非正在人群之中反觀看「花」人？這是毛貴銘寫女官的特殊筆法。將女官比做花，做出美貌的聯想，則另有詮釋空間，一方面，用「花」這個柔媚聯想的詞，不免消解了女官作爲統治者的威嚴；一方面，「爭看」二字傳達喜劇感的集體動作，也諷刺了觀者的獵奇心態，顯示詩人的自覺。

不過，竹枝詞畢竟篇幅短小，只能點到爲止。若要與明代的〈武定歌〉並觀，康熙年間貴州巡撫田雯(1635-1704)所寫的〈東川女官歌〉一詩，更具意義。該詩穿梭於文字與圖像之間，眞實與夢境之間，歷史與現況之間，創造了奇詭之趣。其詩曰：

我觀女官如觀畫，閻立本繪職貢圖。
我觀女官如異夢，奇形詭狀非一徒。
我觀女官入破寺，陰風慘淡魍魎呼。
古鬼昏燈揭钵立，老佛變相獅龍趨。
妖狸髑髏抹粉黛，修羅甲冑呼笙竽。
雌者青氈包蓬首，雄者碧眼拳髭鬚。
女官氣概偉丈夫，火浣大布纏其軀。
九真藤杖紅珊瑚，金環兩耳垂玭珠。
腰下斜掛雙湛盧，繡裙拖地蓮花襦。
自言年紀八十餘，少小生長東川隅。
通侯爵印大如斗，但有刀劍無詩書。
爨僰之兒二萬户，牝雞酋帥風流殊。
四海之大環一島，九州之外何名區？
天子神聖今一統，白環銀甕入上都。
夜郎豈不知漢大，軍門納款非頑愚。
黔州水西黑羅氏，其國郕莒形骸粗。

佯償佗佬不足數，傀儡之戲如斯乎。[103]

田雯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開始擔任貴州巡撫 3 年，頗有政績，[104] 經常走訪各地，探索貴州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他在私人方志《黔書》中，曾引述明初女官奢香與太祖交涉的故事，並在評論中指出，朝廷不直接剿滅水西土司，有其不得已之處，但奢香這樣智勇雙全的女官則的確可稱爲「奇女子」。[105] 然而，這首〈東川女官歌〉寫的並不是歷史上的奢香，而是描寫作者親自「觀女官」的印象。這首詩表達的意思頗爲複雜，用多重的文學意象烘染女土司的權威，同時賦予黑暗沈重的氛圍。這一手法也表達作者對土司制度的疑慮態度，可說預示著之後清廷越加急迫的改土歸流政策。那麼，這位東川女官是誰呢？乾隆時人師範編纂《滇繫》時，收錄了這首詩，並加註：「蓋即祿萬兆之妻安氏也」，[106] 也就是說，〈女官歌〉描寫的是四川的東川土司祿萬兆之妻，曾經左右東川政局數十年的彝族女性「老安氏」。老安氏是相對於媳婦小安氏的稱呼。其實在丈夫死後，老安氏從未被正式任命爲土司，但是老安氏結合小安氏，與另一個媳婦祿氏爭奪土司印，引發長期的「兵連禍結，日尋干戈」，最後反而促使祿氏請求朝廷設流改土，結束了東川的土司統治。[107] 如此

103 〔清〕田雯，《古歡堂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集部，冊 442，卷 7，頁 137。

104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484，列傳 271，文苑 1，頁 13330。

105 〔清〕田雯，《黔書》，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 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冊 3，頁 516。

106 〔清〕師範纂輯，《滇繫》，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雲南省》（臺北：成文出版社，1965），號 139，冊 4，頁 1549。

107 事件的詳細始末可參《東川府志》卷 3「建置」下附「土官祿氏獻土

縱橫東川的老安氏，田雯直接稱她爲「東川女官」，實不爲過。田雯的職位雖是貴州巡撫，但「兼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108] 不免介入東川的繼承奪印事件，當然有可能見到老安氏。因此，〈東川女官歌〉之作，有其現實的基礎，而且作者與女官的接觸，必遠比明代〈武定歌〉更爲貼近。

田雯在此詩的前六句中，連用了三次「我觀女官」，確立彼此之間主、客體的位置。所謂位置，不只是作者是觀察者，女官是被觀察者，也是男性的審視眼光相對於女性的存在，代表中央的大員相對於地方的強大勢力。直到全詩結束，這樣的位置都不曾移動分毫。詩人對女官發表了評論，但女官並未如〈武定歌〉那般牽動詩人的心情。曾有學者指出，此詩一開始就營造陰冷、黑暗的氣氛，是爲了暗示女子執政是一種不正常的「陰氣」，[109] 此說確有見地。正如前述的《芝龕記》，詩人也把東川女官出現的場景，描述爲一個「純陰世界」。田雯作詩講究用字奇麗，爲了渲染東川女官的純陰之氣，他疊用了古寺、昏燈、陰風以表現陰暗的環

歸流始末」，以及卷 14「秩官」。方志對此事以及牽涉的人物都有極為詳細的敘述，老安氏、小安氏、祿氏這幾位女性的形象極為突出。有趣的是，與安氏爭印的祿氏，在自願繳印之後，獲得朝廷養贍終身，死後還被《東川府志》列入「烈女」。〔清〕方桂編，《東川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影印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卷 3，頁 5a-8b；卷 14，頁 17-20；卷 17，頁 3。

108 〔清〕田雯，《蒙齋年譜》，收入〔清〕田同之編，《田氏叢書》（清康熙乾隆間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冊 1，頁 27。

109 詹躍海，〈田雯《東川女官歌》與兩幅「女官圖」〉，《民族文學研究》，期 4（2015 年 8 月），頁 26。

境，又用魑魅、古鬼、妖狸、髑髏、修羅等等引起異類的聯想，佛教變相甚至都在這一場景中造成可怖的印象。如此一來，詩人所觀之女官，早已從「職貢圖」或「百苗圖」畫面的恭謹和悅，轉化爲如「異夢」一般奇詭逼人的形貌。詩人的修辭如此，所以，雖然會見女官是現實中發生的事情，讀來卻如同墜入一個夢境一般，難辨虛實。當詩人開始直接描述女官時，我們則會不斷在相反的兩種想像之間擺盪。例如，雖然是女性，卻是丈夫氣概；手持權力象徵的寶杖，但戴著華麗的耳環；英氣勃勃地配戴鋒利的寶劍，拖地的長裙刺繡著精美的蓮花圖案。在竹枝詞裡平鋪直敘的女官服飾，在田雯筆下卻創造出衝突的視覺效果。這樣的閱讀效果，是否表示作者對操弄權力女土司的厭惡與仇視呢？[110] 筆者倒以爲，固然此詩對女官的態度與竹枝詞的輕快全然不同，但這些奇詭的修辭正傳達著詩人確切地體認女土司的權力，感受女土司對朝廷的威脅。「通侯爵印大如斗」，這不僅指涉女土司正在操縱的奪印大戰，還暗含「如斗印」標誌的女土司的政治地位，更顯現作者面對女土司實際掌握之權力的複雜情緒。正因如此，田雯才會在最後一部分重新拉遠觀看的距離，從中央的立場，用正大的語彙，再次宣示他的發言位置，否定女土司做爲女主的地位，確立羈縻土司對中央的朝貢關係。所謂白環銀甕，用了杜甫〈洗兵馬〉一詩的典：「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111] 也回應了本詩開頭提到的「職貢圖」，圖

110 詹躍海〈田雯《東川女官歌》與兩幅「女官圖」〉即持此說。

111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冊 2，頁 519。

譜一個萬邦來朝的帝國盛景。由以上的解讀，筆者認為田雯〈東川女官歌〉表現的不是寫實，不是獵奇，也不完全是厭惡，而是在不斷試圖確立代表中央的自己與女土司之間的位置。在感受女官陰冽但強大的力量時，詩人作為觀者的地位其實受到了挑戰，陷入夢與戲的模糊地帶，最後以天子聖明、帝國一統的修辭框架住整個觀看的場景，走出夢與戲的迷宮。如此看來，這首詩真可視為表現女主與女酋變像的最好的作品。

尾聲——跨象朝聖闕的演出

本文試圖拓寬歷史上的「女主」的思考範圍，納入筆者所謂「南方女主」，亦即相對於王朝宮廷而地處邊緣，且政治上處於羈縻狀態之地方的女性實質首領，即明清時期所稱之女土司者。不同於北方某些民族如鮮卑人曾建立王朝，太后、皇后可在宮廷中發揮政治影響力，因而被史家視為女主，南方民族在土、流共存的政治中，雖然有女性繼承的習俗，使得女性可以成為制度內的實質首領，但這些女性並未進入我們思考「女主」問題的視野。本文主張，南方女主雖然有地域的限制，不是全國性的君主，但將她們視為歷史上的女主，有幾個彼此依存的重要性。一方面，南方女主以女性而能長期且制度性的繼承，顯示王朝或帝國在面對南方的必要調適，這將引領我們以更多元的方式思考帝制中國(imperial China)的內部。另一方面，近年婦女史研究已在各個領域挑戰了我們對前現代婦女生活的認知，我們若將南方地域性的女性首領納入「女主」的範圍，可以探索傳統中國

不同時代、地區、文化、族群對女性首領的態度，進一步複雜化我們對性別問題的思考。第三，以前述兩項思考爲基礎，筆者的核心議題仍是文人如何回應歷史與現實中南方女主的存在，我們又如何在文人創造的文本中進行文學詮釋。

在這樣的脈絡中，本文先考察冼夫人歷經梁、陳、隋代領導嶺南的事蹟，以及後世對她的詮釋，再回溯對照漢武帝時期在交趾舉兵稱王且後世被尊爲大越之始的二徵姊妹，說明南方女主有極爲長遠的傳統，也從一開始就對王朝具有複雜的意義。由這個對照開始，本文發現在歷史敘事所建構的女主譜系中，出現了「女主」與「女酋」這兩個雖似位在兩端，但其實出自同源又互相纏繞的概念。不同處境下女土司所做的不同政治選擇，決定了在此譜系中的位置，而文人就是在這脈絡中理解文獻或見聞中的南方女主，在不同類型的書寫形式中摹寫其形象，也同時進行文學的虛構與想像。

交趾二徵據象鬪戰的形象極爲強烈，成爲越南抗暴與開國的象徵，但在中國文人的視角下，二徵比起能事三朝的冼夫人，並不足論。奢香、秦良玉這樣能權衡大局的女土司，才能追隨冼夫人成爲文人歌詠的對象，甚至引發文人寄託自己的情懷。而另一方面，在清代田雯的〈東川女官歌〉裡，我們看到文人試圖通過「觀看」，將勢力強大的女土司重新納入朝貢的秩序，但其雜音過於巨大，最終成爲一場魅影變像的惡夢。二徵以下那些女主譜系中的雜音與變像，在這篇作品中此起彼落。

然而，文人建構下的理想女土司與變像女土司，並非女主譜系中的兩條平行線。明代的男女土司入京朝貢是一種常態，那麼，女土司朝貢的景象是否就像「職貢圖」表現的「羅

羅女官」那般敬謹恭順呢？最後，本文將以一個「騎象入京」的故事，再次將問題複雜化。與田雯約略同時代的毛奇齡著有《蠻司合誌》，這是一部纂輯有關西南地區歷史與文化材料的書。我們在裡面發現了這樣一個故事。明代宣德年間，雲南楚雄地方的高思弄繼承了母親的職位，正式進貢。她刻意製造了一個供人觀看的景象：

> 思弄既為楚雄同知，於宣德六年進貢，自卸冠帶，作土婦裝，騎象入彰義門，觀者為之繪土婦貢象圖。[112]

高思弄卸下土司的官服，穿戴民族服飾，高高騎在大象頭上，踏入了北京的彰義門。如此異域風情的公開展示，想必天子腳下的北京人也難以遏抑好奇心。可惜這幅「土婦貢象圖」並未傳世。高思弄所騎的大象，是進貢的貢品，而不是作戰時的座騎，而刻意身著土服，卻是在「演出」自己羅羅族的身分。[113] 與據象鬭戰的形象相比，這個騎象入京、朝拜聖闕的場景，似乎符合明清文人的理想譜系。然而，正因

112 〔清〕毛奇齡，《蠻司合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35，頁 405-406。毛奇齡應有所本，可惜筆者尚未發現更早的文獻記載。

113 《蠻司合誌》中的記載把高思弄描述為一個具有高度表演自覺的人，在接下來的敘事中，高思弄與布政使李榮交涉，在飯局中，思弄並不避忌，「臨更衣，思弄裹皮帽約袜已，繫花桶裙，將覆織衣」，這時李榮突然發問：「聞蠻俗，官婦必刺於兩臂，有之乎？」聽到這個冒犯的問題，女土司鎮定地回答：「無有也」，接著「揎袖出雙臂示之，然後徐斂袖而束以花韈，容止秩然。」〔清〕毛奇齡，《蠻司合誌》，冊 735，頁 405-406。秦良玉在傳說中「有男妾數十人」（《蠻司合誌》即是如此說），所以清初《芝龕記》為了辯誣，特別寫了「斷袖」一折，描寫秦良玉怒斥有意輕薄的官員，並拔劍斷袖，以明己志。《蠻司合誌》記載高思弄的姿態，與《芝龕記》對秦良玉之「忠貞」的想像，不論本質或表現都有很大的差距。這個情節有各種詮釋的可能，而高思弄的遊戲性與表演性也充分展露。

爲高思弄高調的表演，使得這個洋溢光明的南方女主形象，其特立獨行之處反而與清初的東川女官發生聯想。畢竟，若以據象鬬戰與騎象入京作爲文人爲南方女主建構的系譜中的變像與正像，那麼她們正是相依相存，難解難分。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元〕李京著，王叔武輯校，《雲南紀略》。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

〔宋〕司馬光編，《資治通鑑》。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宋〕范曄編，《後漢書》，卷 54，列傳 14。臺北：中華書局，1981。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6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田汝成，《炎徼紀聞》，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冊 3979。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明〕郭子章，《黔記》，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冊 3。成都：巴蜀書社，2006。

〔明〕陳繼儒，《太平清話》，明崇禎九年(1636)二卷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

〔明〕顧起綸，《昆明集》，下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攝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昆明五華書院刊本。

〔唐〕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唐〕徐堅編，《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

〔唐〕魏徵編，《隋書》，卷 80，列傳 45。臺北：中華書局，1981。

〔清〕方桂編，《東川府志》，卷 3、14、17。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影印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清〕毛奇齡，《蠻司合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毛貴銘，《黔苗竹枝詞》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6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田雯，《古歡堂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冊 442，卷 7。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清〕田雯，《蒙齋年譜》，收入田同之編，《田氏叢書》，冊 1。清康熙乾隆間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清〕田雯，《黔書》，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冊 3。成都：巴蜀書社，2006。

〔清〕吳偉業，《臨春閣》，收入《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清〕吳嵩梁，《香蘇山館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李珍，《明季水西記略》，收入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冊 12。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冊 3926。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金史，《無雙譜》，收入《中國歷代人物像傳續編》，冊 2。濟南：齊魯書社，2014。

〔清〕范端昂，《粵中見聞》，收入《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

冊 56-57。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清〕師範纂輯，《滇繫》，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雲南省》，號 139，冊 4。臺北：成文出版社，1965。

〔清〕張廷玉等編，《明史》，卷 270，列傳 158。臺北：中華書局，1981。

〔清〕舒位，《缾水齋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479，別集，卷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黃宅中修，鄒漢勳纂，《大定府志．文徵六》，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冊 49，卷 58。成都：巴蜀書社，2006。

〔清〕董榕，《芝龕記》，收入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484，列傳 271，文苑 1。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薛載德纂，衛既齊修，閻興邦補修，《貴州通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省志輯》，冊 13。成都：巴蜀書社，2006。

〔清〕謝肇淛，《五雜組》，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子部，冊 37，卷 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隋〕姚察編，《陳書》，卷 7，列傳 1。臺北：中華書局，198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刊，《明實錄》，冊 6、17、80。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

吉鍾穎編，《鶴峰州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冊 4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吳梅，《中國戲曲概論》，收入《民國叢書》，輯 1，冊 63。上海：上海書店，1989。

秦良玉史研究編纂委員會編，《秦良玉史料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
陳世法等撰，《嶺南摭怪列傳》，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甲本，冊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冊 6。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
劉錚雲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史部，冊 21。臺北：中央研究院，2015。
黎文休、潘孚先、吳士連等編，孫曉主編，《大越史記全書》。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二、專書

李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臺北：三民書局，2002。
杜桂萍，《清初雜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張純德、朱琚元、白興發著，《彝文古籍與西南邊疆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陳芳，《清初雜劇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
陳重金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陳雄，《冼夫人在海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
喬玉紅，《古代嶺南女性社會形象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7。
賀喜，《亦神亦祖：粵西南信仰構建的社會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

劉鋒，《百苗圖疏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龔蔭，《明清雲南土司通纂》。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5。

Lee, Hui-shu.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Li, Wai-yee.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Zhu, Jing. *Visualising Ethnicity in the Southwest Borderlands: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 2020.

三、論文

王正華，〈走向「公開化」：慈禧肖像的風格形式、政治運作與形象塑造〉，《美術史研究集刊》，期 32，2012 年 3 月，頁 239-320。

王鵬惠，〈觀畫如異夢：《百苗圖》之「女官」版本比較研究〉，發表於「雛鳳清聲──文哲青年學者夏季論壇(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 年 7 月 22 日。

余慧君，〈從皇家靈囿到萬生園──大清帝國的動物收藏與展示〉，《新史學》，卷 29 期 1，2018 年 3 月，頁 1-57。

宋恩常，〈明代彝族女土官史料初輯〉，收入雲南省編輯組編，《雲南彝族社會歷史調查》。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 388-405。

李沛琦，〈明清海南島女性神信仰的文化地理學考察〉。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20 年 6 月。

李惠儀，〈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嶺南學報》，輯 1-2，

2015 年 3 月，頁 85-108。
杜芳琴，〈中國歷代女主與女主政治略論〉，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集 4。臺北：稻香出版社，1995，頁 35-60。
冼春梅，〈粵西高州地區冼夫人民間祭祀圈與信仰圈〉，《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學報》，卷 25 期 2，2015 年 4 月，頁 91-94。
林宜蓉，〈世變下士子撰史的多元意蘊——試論屈大均《廣東新語》之化外深意〉，《清華學報》，卷 50 期 1，2010 年 3 月，頁 61-101。
胡曉眞，〈通俗與審美：中國西南地區女土司的貢物〉，收入崔基淑編，《集體情感的譜系：東亞的集體情感和文化政治》，第二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8，頁 215-234。
康其，〈明代少數民族上層女性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呼倫貝爾學院學報》，卷 27 期 5，2019 年 10 月，頁 16-23。
張秀蓉，〈論《廣東新語》的經世之學〉，《東吳歷史學報》，期 7，2001 年 3 月，頁 53-84。
張筱梅、王馗，〈吳偉業《臨春閣》雜劇中的冼夫人〉，收入盧方圓、葉春生主編，《嶺南聖母的文化與信仰：冼夫人與高州》。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 143-151。
許正弘，〈元答己太后與漢文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期 53，2011 年 7 月，頁 89-108。
許媛婷，〈託畫以言志——論金古良《南陵無雙譜》版本及其繪編意旨〉，《故宮文物月刊》，期 263，2005 年 2 月，頁 48-58。
連瑞枝，〈土官與他們的女兒——帝國周邊的政治與社會聯盟〉，《臺大歷史學報》，期 65，2020 年 6 月，頁 33-74。
陳寅恪，〈梁陳時期氏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收入萬繩南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

1987，頁 202-214。
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本 11，1943 年，頁 1-25。
黃明光，〈南方各省女土官執政現象研究〉，《廣西民族師範學院學報》，卷 30 期 1，2013 年 2 月，頁 21-25。
黃開華，〈明代土司制度設施與西南開發〉，收入《明史論叢》，冊 5。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頁 27-217。
楊中薇，〈論吳偉業的遺民製作——《臨春閣》與《秣陵春》劇作中的「物」、「才女」與「離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4 月。
楊聯陞，〈中國歷史上的女主〉，《食貨月刊》，期 11，1972 年 2 月，頁 570-577。
詹躍海，〈田雯《東川女官歌》與兩幅「女官圖」〉，《民族文學研究》，期 4，2015 年 8 月，頁 24-31。
劉靜貞，〈從皇后干政到太后攝政——北宋眞宗之際女主政治權力試探〉，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91，頁 123-161。
蔡玉琴，〈越南年畫中的中國元素與本土特色〉，《中國政法大學學報》，期 5，2008 年 10 月，頁 63-81。
蔡幸娟，〈時論與北朝女主政治——兼論漢魏時代女主政治時論之濫觴〉，《成大歷史學報》，期 25，1999 年 12 月，頁 39-65。
黨會先，〈明清西南地區女土司述略〉，《遵義示範學院學報》，卷 22 期 6，2020 年 12 月，頁 18-23。
龔禮茹，《嶺南女神信仰研究——以龍母、冼夫人和媽祖爲中心》。深圳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8 年 6 月。
McMahon, Keith. “Women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 *Nan Nü* 15:2,

January 2013, pp. 179-218.

Yang, Lien-sheng. "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3, 1961, pp. 47-61.

四、網路資料

Vietnam Nation Museum of History, http://baotanglichsu.vn/vi/Articles/3098/14281/cuoc-khoi-nghia-cua-trieu-thi-trinh.html（2021 年 10 月 15 日查閱）

Riding through the Imperial City Gate on an Elephant's Back: Women Rulers of the South in Literary Imagination

Siao-chen Hu*

Abstract

Since Lien-sheng Yang published his seminal work "Female Rulers in China,"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dowagers and empresses of imperial dynasties who held political power in place of their sons or husbands.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however, women rulers have been common instead of exceptional. Known as *nü tusi*, or female chieftains, women rulers of the local non-Han peoples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literati because they challenged Confucian social norms. The Chinese literati made a genealogy of women rulers of the south, representing them in various types of texts, including historical records, miscellaneous notes, gazetteers, fictions and pictorial images.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some examples to discuss how the images of women rulers of the south were formed rhetorically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s.

Keywords: Female ruler, female rebel, female chieftain, Lady Xian, the south

---

*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